

丞相世家

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研究

戴仁柱 著/刘广丰 惠 冬 译

中华书局

史氏是文官士大夫的典型代表，
他们在宋朝的社会地位，
与科举的成功与否息息相关。

Bureaucratic Success and Kinship Fortunes for
the Shih of Ming-chou

丞相世家

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研究

戴仁柱 著 / 刘广丰 惠 冬 译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丞相世家: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研究/(美)戴仁柱著;刘广丰,惠冬译. —北京:中华书局,2014.6
ISBN 978-7-101-10121-8

I. 丞… II. ①戴…②刘…③惠… III. 家族-研究-中国-南宋 IV. K8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80743 号

书 名	丞相世家: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研究
著 者	[美]戴仁柱
译 者	刘广丰 惠 冬
责任编辑	胡 珂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4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20½ 插页 2 字数 265 千字
印 数	1-15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0121-8
定 价	78.00 元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恩师刘子健教授

序

稍微了解一些南宋历史的人都知道，一部南宋政治史，贯穿着权相的统治。专权达十年以上的权相，即有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四人，合称“四大权相”。秦桧专权约 16 年，韩侂胄 14 年，史弥远 27 年，贾似道 22 年，合计 79 年之久。南宋自 1127 年至 1279 年，共计 152 年，四大权相的专政时间超过了一半，对南宋政治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对“四大权相”的研究，一直都比较缺乏，相关论著十分罕见。在“四大权相”中，史弥远和贾似道的专权时间最长，即使放入两宋 320 年历史中，也位列第一、第二位。而在“四大权相”中，也以史弥远与贾似道的研究更为不足。中国大陆学者中，贾似道的研究著述尚曾见到，而史弥远的研究论著，就更寥若晨星了。

美国学者戴仁柱(Richard L. Davis)先生，乃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高材生，师从著名美籍华裔学者刘子健先生(1919—1993)攻读博士学位，故其治学，深受刘先生影响。鉴于南宋史研究的缺乏，刘子健先生曾大力呼吁加强南宋史研究，并身体力行，发表了多篇指导性的论文，提出了不少高见。本书的初稿，即是戴先生在刘先生指导下所作的博士论文，经修订后，于 1986 年出版了英文版。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对外交流有限，加之又是英文著作，因此，戴先生的大著鲜为中文读者所知，实在遗憾。2006 年，戴先生到香港岭南大学任教后，来往方便，大陆也完全开放，故而交往日密。2009 年，



经我介绍，戴先生同意并授权，刘广丰博士与惠冬博士生共同将此书译为中文，书名定为《丞相世家：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研究》。经过一年多努力，中文稿已译妥，即将交中华书局付梓。戴先生希望我作个序，不能推辞，慨然应允。由于戴先生精通中文，两位博士又都是专攻宋史的，故而此书的中译，具有相当高的水准，是中译史学著作中较好的一种。此书的出版，不仅使我们可以通过戴先生的大著窥知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状况，也可以说是中美学术与文化的交流。是故，也乐为之序。

从政治学角度出发，作者认为，“宋朝政府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政治权力总体上的制度化和宰相在具体实施层面的自主权”，并将其称为“中国历史的积极进展”。因此，他对四明史氏家族的三位宰相都寄予了极大的关注，进行了热情的称赞。他认为，“史氏最终创造了宋朝最伟大的成功史”，出现了 28 位进士，200 多位各级官员，“史氏族人在南宋的权力巅峰是在宁宗、理宗两朝，他们支配着临安朝廷，所拥有的政治权力无人能及”，将明州变成了全国的政治核心（见第一章《四明故事》）。作者在《绪论》中谈及选择明州史氏家族为研究对象时提出了三个原因：“第一，他们创造了可能是那个朝代最震撼人心的成功史。”第二，史氏家族步入官场及升迁，主要依赖于科举体系，而这种经历是当时大部分士大夫晋升的缩影。第三，史氏家族一直受到皇帝眷顾，其衰败是自然过程，并非突发的朝廷政变的结果。这种选择说明，作者是把史氏家族作为科举制度下成功的一大家族来看待的，这个家族的发展史乃是一部辉煌的成功史，其衰败则是“自然过程”。从“考镜源流”、“植根皇城”到“春华秋盛”，作者用三章的篇幅叙述了史氏的家世、发迹直至辉煌的历史，重点是史弥远。作者将开禧三年诛杀韩侂胄的主谋认定为杨皇后，而史弥远仅是帮凶，这一观点是令人颇感新鲜的。

本书的最大优点，是作者融会史料后以通俗文字写出，流畅易懂。当然，这



与译者有很大关系,但作者原文是基础,是最为重要的,否则,译者纵有通天本事,亦难完全改变原有文风,而另成一番风貌。

深入浅出,有鲜明的时代感,是本书的第二大优点。刘子健先生重视南宋史的研究,力求从整体上把握与剖析南宋政局,有一系列精彩论断。作为刘先生的高足,作者奠基于此,进而分析四明史氏家族在南宋中后期政局的发展及影响,开掘甚深,并加深了我们对当时南宋局势的认识,再配以通俗流畅之文字,不愧“深入浅出”四字,殊足称道。

因是较早与少见的有关史弥远家族的专门研究,本书颇多创获。如对于史浩政治态度的分析,对于杀韩侂胄事变与史弥远时代后宫杨皇后的作用的考察,对于史嵩之政绩的开掘,都颇见新意,为本书增添了光彩。总之,本书是一部较好而又通俗易懂的史学著作,值得一读。当然,本书也有一些瑕疵,此不赘言,当另文指出。

自2006年到香港岭南大学任讲座教授兼历史系主任之后,戴先生参与大陆学术活动日益频繁,对他熟悉的大陆学者也逐日增多。他的《山下有风》一书,就颇受青睐;而《伶人·武士·猎手:后唐庄宗李存勖传》更是广传。相信本书的出版,亦会引人注目,增强人们对于南宋史研究的了解和兴趣。近年来,杭州市南宋史研究中心在南宋史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出版了几十部著作。本书的出版,亦为这一工作添了砖,加了瓦,值得称道。尤其是作为一个美国人来说,更为难得。

张其凡

二〇一一年六月七日

于广州暨南花园

悼念我的恩师刘子健教授^①

刘子健先生一生学术成就非凡。在现代的学术文化中，人们总是很自然地去量化一位学者的成就，说他们博学多才，著作等身。而若非以数量作为衡量标准，人们就得评判这位学者的学术观点是否能够不断创新，永无止息。无论是以哪种标准作为衡量，刘子健先生在学术界里都绝非懒散之人。实际上，他为美国的宋史研究打下了主要的基础。

他主要关注政治史，但也孜孜不倦地去研究文化、学术和社会问题，就这样，他为史书上刻板的朝廷事务与文人生活注入了新的生命。他的眼光独到，文笔畅达。其著作之目的一直在于鼓励后辈新人，而非让学术小圈子里的专家们孤芳自赏。其著述话题广泛，且言之有物，深深打动我辈学人，而我跟其他很多人就是因此进入宋史研究领域的。然而，在刘先生看来，学术的最终回报在于教育，而他本人也乐于成为同学们的良师益友。

作为1975年入学的普林斯顿研究生，我认为刘先生对历史材料的掌握可谓得心应手，在宋史学界里没有任何其他学者能与之相比，当然，我指的是西方

^① 译者按：此文乃戴仁柱于1993年刘子健先生的追悼会上公开诵读的悼文。本书是戴仁柱在刘子健先生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而刘先生对戴仁柱一生的影响与帮助都非常大，戴仁柱认为，应该通过此书，公开这篇悼文，以与读者分享他对恩师的怀念与评价。



学界。每当谈到藏有大量宋代文献的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时，我总是不可避免地提到我的指导老师在早年带着我参观这个图书馆的往事。当我以为自己发现一部新的或鲜为人知的文献时，我总能发现刘子健先生在那里塞过一张纸条，或折过一页书角。事实上，根据这一个个折过的书角，以及一张张纸片的年份，人们可以重构出刘教授来到普林斯顿后近三十年来学术生涯的发展与转变——他的研究领域从 11 世纪转向 12、13 世纪，从文化史转向政治史。

后来我发现，刘先生大多数的文书工作并非为了他自己，而是其他人。作为这个国家里（译者按：指美国）关于中国中古时代历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很多年轻的学者都来寻求他的帮助，请求他帮忙修改论文初稿，而他来者不拒，欣然为之。这正是一种社区互动的服务，但这一切都是义务的，因为相关学术机构不会为此给他任何报酬。作为这一领域中非常著名的公众人物，刘先生很慷慨地为与他毫不相干的个人和机构挤出自己的私人时间。尽管如此，他还是给予自己的学生最大的关注——这一点我自己深有体会。

1981 年我离开了普林斯顿，先后去了明德学院和杜克大学，这两所学校都没有专门的汉学研究。然而，我每隔几个星期就会收到刘子健先生的来信，有时候还更加频密。信中总是有一些他偶然发现的材料的复印件，这些材料非常罕见，但我当时的研究极其重要。我在普林斯顿的博士论文出版成书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还不间断地给我写信，而此时，我的另一本著作也将要完成了。刘先生对我的关怀既持续又体贴，我从这位曾经的师长身上学到了很多，尤其是他对后辈倾囊相授的学术品质。而如今，我们已经是同一学术领域中的同行者了。

直到四年前，我才深刻意识到我一直以来深受刘子健先生的恩惠，也意识到我们之间的学术交流极具价值，那是夏天一个漫长的下午，我们在普林斯顿的职员会所里。最开始，我们只是漫无目的地讨论宋代的政治，但最终，两人的



悼念我的恩师刘子健教授

讨论集中到了宋代閤门使这一小官职上。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几乎是零，而原始材料既简单又分散。于是，我们只能靠自己去重构相关的历史了。这是一次有趣而刺激的讨论，我们不断交换信息与观点，寻找各种不同的参考书目和相关的奇闻轶事。但三小时后我们分开时，刚才的激情瞬间消失，一种强烈的孤独感在我的脑海里油然而生。对我来说，刘子健先生不但是一位研究中古时代政治史的历史学家，他更是一种珍贵且无法代替的资源。他研究中国历史当中不受重视的历史，而且使这种研究日渐受到重视。如果没有他，这些早被边缘化的问题可能更加无人理睬。

戴仁柱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七日



宁波宋元墓葬群

自序

今天，在风景秀丽的宁波东钱湖畔，游客们也许会对这里遍布的宋元墓葬群感到惊异。这些陵墓让人感受到当年的宁波——尤其是鄞县的繁盛，它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引擎，还是一个孕育了许多伟大的文化精英和政治领袖的渊薮。当地士人渴望出人头地，从而使宁波得以超越包括杭州和南京在内的其他江南古城。城内的天一阁，作为一座以华美庭院和稀见图书而闻名的藏书楼，也是宁波悠久历史的见证。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当我开始研究南宋史氏家族时，宁波尚未对外开放，东钱湖畔的墓葬群也未被世人所熟知，关于当地历史的研究成果也寥寥无几。我写于 1980 年的博士论文——1986 年成为我的第一本著作，主要是基于在台湾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以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的研究。1985 年，我第一次造访宁波，并没有获得多少对论文有帮助的原始材料。令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在短短十年之后，历史会焕发出如此勃勃生机：宁波这座曾经濒亡的城市重获新生，当地图书馆前所未有地对外国学者敞开怀抱，隐匿于乡野之间的墓葬被修葺一新。尤为重要的是，现今还能找到史氏后人，获取到极珍贵的文献资料和遗物。1995 年的第二次宁波之旅，使我极大地丰富了对这片土地及其人民的认知——过去，我只能远远地研究他们。在此，我得感谢当时宁波文物管理处几位先生的热情照顾和帮忙，



包括杨古城和曹厚德。

本书的英文版面世二十五年后，当我准备推出中文版之际，我觉得进行大幅度的修订似乎要比轻率地翻译原版更为重要。1986 年的版本，更像是一本充满大量图表、附录、严格的注脚以及广泛征引文献的博士论文。原版之中包含了泾渭分明的两部分：史氏作为一个南宋士大夫家族的政治史的故事，和在史氏家族际遇的基础之上展开的社会史的分析。对于中文版，我决定聚焦于前者。读者若是对社会流动中存在的问题有进一步的兴趣，我建议他们去阅读英文原版。同时，我也决定在中文版中稍为缩减对研究成果的引用，因为要将最近几十年的新成果整合到原版之中，是一件令人生畏的工作；而简单地重复这些成果也似乎是毫无意义的。起初，我对史氏家族的复原是基于一些宗谱，尤其是《萧山史氏宗谱》，这是一个裔承宁波群体的家族谱系。我在本书中广泛引用了这一宗谱的材料，而在今天很多历史学家看来，这是一些次要的史料，因为他们认为宗谱夸大了家族的荣誉，作为历史资料并不十分可靠。这些宗谱文件确实是现实与神话的大杂烩，但我们应该知道宗谱还有另外一个作用，那就是提醒族人们一些应尽的义务，其中包括为生者尽孝，为死者服丧——这是中国礼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也正是这一因素，使得人们在编撰宗谱时小心翼翼。在宗谱中，有关族中男女一生的故事也许会被夸大，但族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非常准确的，这也正是我在写作本书时，对宗谱感兴趣的原因。我原本还想把从鄞县获得的更多更新的材料纳入新版之中，但时间上却不允许。

我经常追问，为什么宁波的政治家族在历史上会如此富有争议，同时代的人经常指责他们为了获取统治地位而牺牲其他地区的人们。语言可能是其中一个因素。宁波方言非常独特，即便是近在咫尺的杭州人或上海人都难以理解。当宁波人离开家乡去入仕或者经商，他们便会在居住地组建同乡会；反过



来,这也让他们表现得更像是外乡人。也就是说,他们似乎拒绝融入到新的居住地,并以之为家乡。当然,在宋代,当士大夫们抱怨“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人”的时候,他们也是把明州人视作外人进行抨击的。清朝也是如此,在一些地方,例如上海,宁波籍人的势力反映在诸如宁帮之类的商帮、会馆之类的社交场所,以及通过联姻而形成的战略同盟上。五十年前在台湾,蒋介石同样具有以宁波本土社团为中心的社交倾向,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推举他的儿子蒋经国来继承自己的权位。

对于处在分散状态的少数派团体来说,阶层、教育程度和思想观念之间的差别,往往使他们趋于弥散。但最终我仍然相信,对于宋朝史氏家族的争议,不是因为他们构建了一个支持同乡人的网络,而是他们的政治家族比其他士大夫家族更加强大,甚至超越了皇族。在这出政治家族的剧目里,史氏在朋友艳羡的目光中平步青云,又在对手的愤恨声中一蹶不振。他们在南宋的经历,和今日美国的肯尼迪或布什等政治家族并没有什么两样:卓越的功绩往往会招来普遍的排斥。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试图摒弃七百多年来的历史偏见,努力从史氏家族自身的角度去理解他们。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许多不甚妥当的先入之见进行批判,并重新评估,尤其是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权相”观念: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这个词暗示了相权的滥用,以及通过贪污受贿和任人唯亲等形式进行的大权独揽。北宋设立了一套将行政、军事、经济诸权分离的政治架构——这种体系继承自五代——不料到了南宋,首相会被再次赋予广泛的权力。这个变化是优是劣还需日后讨论,但这个转变的历史性质却是无可置疑的。宋朝尝试了许多模式——一个比一个成功,正是这种试探和推进底线的意愿使得那个时代饶有兴味。通过政治学的训练和比较政治学的浸淫,我坚信,政治权力总体上的制度化和宰相在具体实施层面的自主权——宋朝政府的一个主要特征——



代表了中国历史的积极进展，它表明宋朝之前那种君主个人独裁的模式发生了转变。在加强行政自主权上，权相们具有扮演积极角色的潜在可能，但只有在他们既具资格、又有能力时才能办到，史弥远恰恰兼而有之。

我对史氏家族的兴趣源于对史弥远的关注，他是南宋权相的象征，却又不因陈习，恪尽职守，为促进国家利益而鞠躬尽瘁。在他任职的二十五年间，他的家族显然从中获得了不少好处，却又没有达到一些同僚所批评的程度，他还是紧紧约束了自己的家族，这就是周密为什么会说“史忠献当国日，待族党加严”的原因。他是一个正直而自律的人，对帝国的贡献远大于他的失误。

然而，到了明清时代，统治者实行极权统治，并认为“权相”是对他们权力的一种威胁，于是长期以修史的方式对他们加以谴责。二十多年前，我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是关于明清之际史弥远从“权相”到“奸相”的形象转变的^①。我注意到，元人编写的《宋史》虽是官方正史，但却有很多矛盾之处，其中对嘉定十七年（1224）赵竑被逐、赵昀继位一事，就有三种记载。宁宗的本纪认为，皇帝卷入了让赵昀继位之事，据说是他在临终之前把赵昀封为皇子的。杨皇后的传记则认为，史弥远是唯一一个策划这起阴谋的人，是他威胁杨皇后，让杨皇后屈服的。在这次历史事件中，赵竑是被废的皇子，其传记则暗示，史弥远是赵竑的主要反对者，但该传记认为，史丞相早在多年以前就把其他朝廷重臣拖下水，以为将来废除赵竑打下基础，郑清之就是其中一个，因此，这起阴谋策划的时间很长，涉及的范围也很广。但令人吃惊的是，史弥远的官方传记对于这一事件并没有多少记载。官方史学家有意不把史弥远列入《奸臣传》中，这正好反映他们对他参与这一事件的程度抱有怀疑态度，相反，他们更加认可他在宋代政治中

^① 见戴仁柱：《历史上对南宋成见的形成及其演化——以史弥远为例》，载衣川强主编：《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集》，京都：同朋舍 1989 年版，第 357—386 页。该文的中文翻译已收入本书附录四。



的积极作用。《宋史》的这种矛盾与含糊在元代其他描写赵竑事件的著作中也有所反映：周密两本可信度较高的作品，《齐东野语》和《癸辛杂识》，从来没有认为史弥远在此事上采用了非法手段，或者单独施为；相反，这两本书都认为杨皇后很早就开始讨厌赵竑了，因为他冷落妻子，而这位夫人正是杨皇后的闺中密友。另外一部元代著作——《两朝纲目备要》，认为废除赵竑是临时决定的，而且它也没有把责任单纯归在史弥远身上。谨慎似乎是元代史学家的普遍特征，在材料不一致的情况下，他们不会妄下判断。

一直到了明代中晚期，历史学家才开始把赵竑事件定性为史弥远单独施为的犯罪行为，并因此把他作为奸臣加以批判。第一部把史弥远归为“奸臣”的著名作品，是王洙写的《宋史质》，而此书恰恰是明代说教性最强，而可信度最低的一本书；王洙不但认为史弥远是奸臣，而且是权奸。但我认为，明代有关宋朝的著作，写得更多的是明朝而非宋朝。明正德十六年（1521），王洙已经进入京城参加科举考试，而当时，内阁首辅杨廷和与张太后称武宗正德皇帝遗旨，选朱厚熜为帝，这就是明世宗嘉靖皇帝——这一举动后来引起了一系列的政治阴谋和纷争。嘉定十七年（1224）和正德十六年的事件相似得令人吃惊，而攻击一个像史弥远那样的历史人物，比攻击当时的朝廷大臣在政治上却少几分风险。柯维骥是比王洙稍晚的一位历史学家，他是《宋史新编》的作者，他在评判史弥远的“恶行”时没有过分感情用事，并且遵循《宋史》没有把他列为奸臣，他更愿意用“权臣”来代替；然而，他对史弥远的总体评价比起《宋史》还是更为负面。《南宋书》并没有像柯维骥那样有所保留，它的作者是钱士升，曾在明末担任内阁辅臣，他的这本史书应该是在明朝灭亡之后写的。跟王洙一样，钱士升把赵竑被逐一事描写成史弥远单独施为的罪行，并且进一步认为史弥远从头到脚都是一个权奸。同样显著的是，这三部晚明作品的作者都是东南人，离南宋的权力中心很近，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对这一